



敦煌学研究丛书
主编 季羨林

敦煌学新论

荣新江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21世纪的敦煌学将别开洞天，仍能保持青春活力
敦煌学百年——海外汉学的奉献
敦煌文献新材料与新问题
敦煌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学新论/荣新江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敦煌学研究丛书)
ISBN 7-5423-1123-9

I. 敦… II. 荣… III. 敦煌学—研究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1017 号

责任编辑: 白玉岱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王保华

敦煌学新论

荣新江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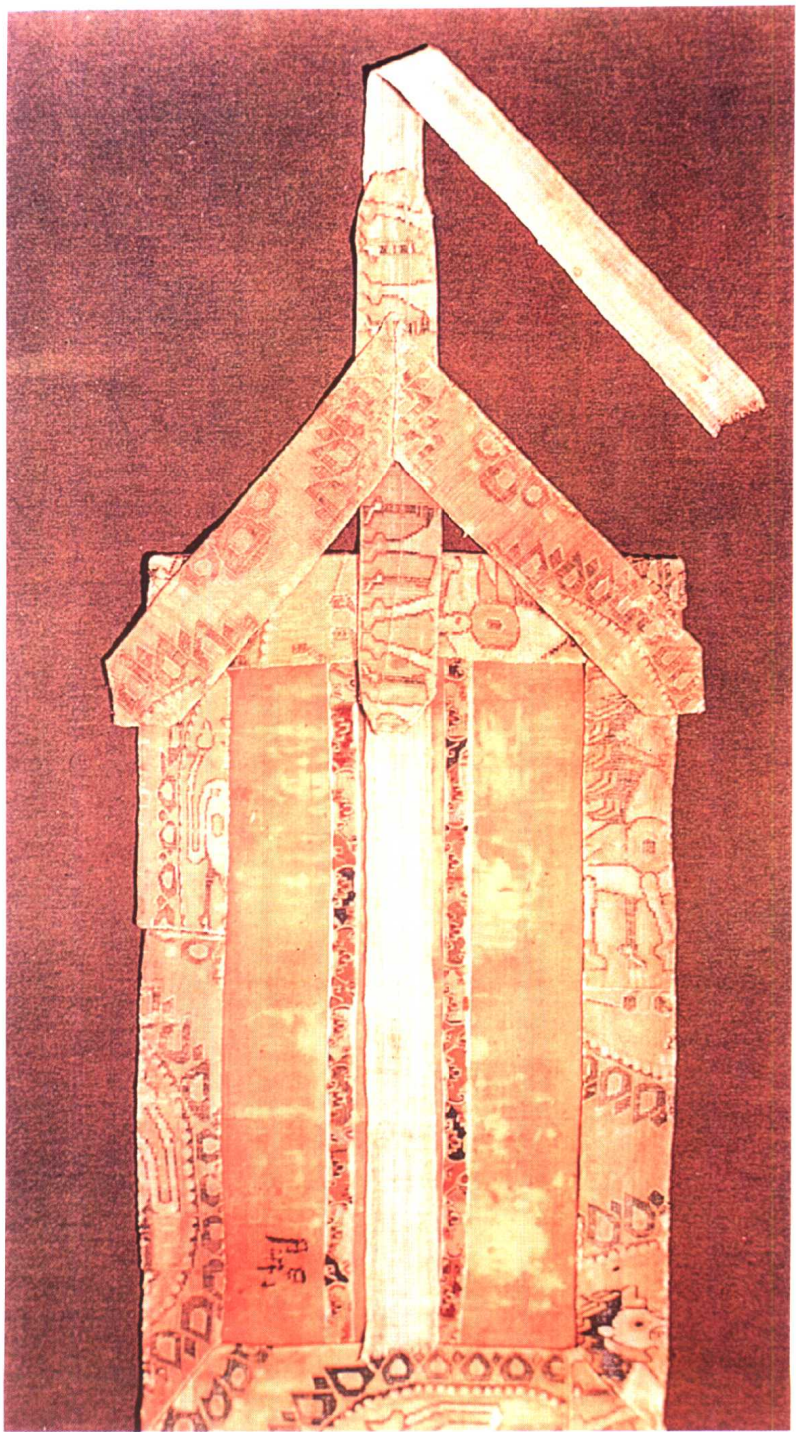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6 字数 300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5423-1123-9/K·63 定价: 32.00 元



彩版一 敦煌藏经洞出土经帙 (Ch. Xviii: 001)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p. 117, fig. 91)



彩版一 端方旧藏《观音菩萨像》

(《敦煌画の研究·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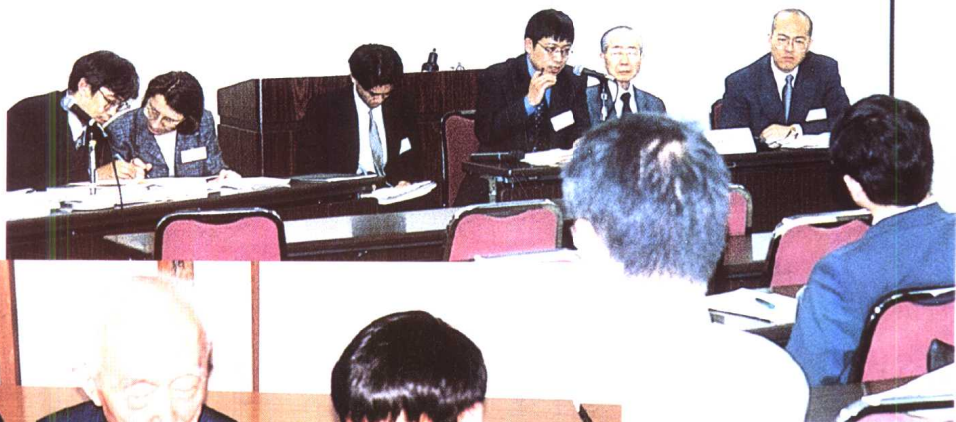
彩版三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药师琉璃光如来家》

(王惠民先生提供)

回国際東方学者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煌吐魯番研究分会场
彩版四 日本第四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敦
(日本东方学会提供)



彩版六 笔者向季羨林先生请教

彩版五 “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会议代表在英国图书馆前合影

(国际敦煌学项目提供)



ORIENTAL
AND
MEDIA OFFICE
COLLECTIONS

序

季羨林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二〇〇〇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

敦 煌 学 研 究 丛 书

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八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意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

目 录



敦煌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1
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	
——三界寺与藏经洞	8
法门寺与敦煌	29
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	52
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	65
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	78
有关甘肃藏敦煌文献的珍贵记录	85
北京大学与敦煌学	98
略谈敦煌学研究对欧美汉学的贡献	114
敦煌学百年：海外汉学的奉献	126
“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学术研 讨会简介	133
我们应当怎样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 周年	139
敦煌学：21 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	144
敦煌文献与古籍整理	151



敦煌古籍整理现状与评议	162
敦煌文献整理校录琐议	177
敦煌文献：新材料与新问题	180
重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	183
《英藏敦煌文献》写本定名商补	186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评介	207
郑阿财、朱凤玉主编《敦煌学研究论著 目录（1908 - 1997）》评介	215
中国美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 论著目录索引》序	221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评介	223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	230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 生活》评介	236
敦煌地理文献的价值与研究	242
《唐刺史考》补遗	259
中国所藏吐鲁番文书及其对中古史研究的 贡献	273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评介	296
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评介	303
柏林通讯录	309
近年于阗语及其文献研究论著评介	



.....	323
罗布泊——中国西部探险的热点话题	
.....	337
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其人其事	
——《新疆地下的文化宝藏》中译本序	
.....	341
陈寅恪撰《敦煌零拾》札记整理后记	
.....	348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前言	354
重读敦煌书序 追念恭三先生	363
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	368
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	
——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读后	374
才高四海 学贯八书	
——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	381
后记	396

敦煌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丝路上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由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较频繁，敦煌曾经汇聚了东西方的多种文化。然而，北宋以降，因为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取代陆上丝路而繁荣起来，特别是明朝把敦煌弃置于嘉峪关之外，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地区日益荒凉下来，甚至成为从吐鲁番地区来的维吾尔族人放牧的场所。敦煌城东南鸣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渐渐为人遗忘，成为牧羊人憩息的地方，数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也任凭风沙日以继夜地吹拂。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日渐衰落的清朝末叶，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敦煌，仍然没有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偌大一个莫高窟群，由一个从肃州退伍却回家不成的王道士看管起来。而此时充满进取心的各种类型的西方探险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敦煌莫高窟，在1900年以前，俄国的普尔热瓦斯基、匈牙利的洛克济、法国的邦宁等人，都曾走访过敦煌千佛洞，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地理探查。敦煌考古时代的开端，是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嚆矢的。

王道士名圆箒，湖北人。他在敦煌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住下来以后，四处化缘，还雇了几个伙计帮忙清扫长年堆积在窟前的沙子。他自作聪明地把一些佛像改造成道教的灵官，还把一些



洞窟间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开凿在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窟室大体上分为上中下三层，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拂，沙子从窟顶蔓延下来，把底层一些洞窟的洞口埋了起来。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对面的大窟（现编为第16窟）洞口甬道堆满的沙土已经渐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现甬道北壁的壁画后面可能有洞。于是“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10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敦煌石室记》）这段出自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画家谢稚柳先生的记载，比较真实准确地描写了藏经洞（现编为第17窟）发现时的情形。

一座给20世纪的学术研究带来丰富素材的文化宝库就这样被发现了，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完全不懂得考古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可惜的是，号称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献，不是像甲骨文和明清档案那样首先被中国学者所认识；也不像敦煌西域汉晋简牍那样由外国考古学者所掘得，而是落入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王道士手中。

面对这么多的经卷和绘画品，王道士当然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官僚士大夫们，但这些人都不识货，也没有人去追问这些古老的经卷和绘画是从哪里来的。1903-1904年，金石学家叶昌炽任甘肃学台，敦煌县令汪宗翰送给他藏经洞出土的《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等，敦煌文人王宗海也送给他《大般若经》、《开益经》、《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等。叶昌炽在他的《缘督庐日记》中，第一次判定了敦煌文献和绢画的重要学术价值，但他当时误以为石室所出，只有“藏经数百卷”，“各人分取”，已经分光。过去学术界都传说叶昌炽曾建议甘肃藩



台把所有藏经洞古物运到省垣兰州保存，但因运费没有着落，没有成功。细检近年由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刊行的《缘督庐日记》全本，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从叶昌炽当时不知有数万写本被发现的情形来推测，这个传说大概也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学者与敦煌宝藏失之交臂，不到三年，一位在中国新疆已经盗掘了大量古物并运回伦敦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这位受过严格的考古学和东方语文训练的学者，由此成为当时来中亚考古的一批西方探险家中最有收获的一个。

1907年3月，斯坦因根据他的同乡洛克济的建议，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当他得知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本和绘画以后，就耐心地等待外出化缘的王道士回来。5月间，王道士回到莫高窟，不懂中文的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秘书蒋孝琬与王道士谈判，利用编造的花言巧语，骗得王道士的信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斯坦因被允许进入藏经洞。然而，当时的藏经洞中塞满了写卷、绢纸绘画的包裹，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所以，斯坦因就在16窟中搭了个帐篷，由蒋孝琬和王道士夜间把包裹运到帐篷中展示给他。在包裹搬出大半后，他进洞清理，把藏经洞中的文献和文物翻了个底朝天，最后露出里层的壁画和镶在墙里的《洪辩告身碑》。

根据斯坦因的观察，在他到来以前，藏经洞内堆放的物品上层已经被人打乱，但大体上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洞中所有的材料原来都是分类包在两种包裹皮中的，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装12个卷子，还有80个装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类是所谓“杂包裹”，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和回鹘文、粟特文卷轴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修补佛经或佛画的文书、废纸、木棍等等，都分类装存。其实斯坦因不懂得中国古代藏书是分帙存放的，那平均装12个卷子的包裹实即装着写卷的经帙。而王道士当然更不懂



这些文献的价值，当他和斯坦因以四个马蹄银成交时，他留下的是那些他看上去书法精美的普通佛经，而斯坦因除了获得 270 个装有汉、藏文写卷的“正规包裹”外，更多地是得到了装有艺术品和非汉文文献的“杂包裹”，也就是说，斯坦因装走的 29 箱材料，从学术研究而不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是更有价值的。

除藏经洞外，斯坦因还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像、壁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记录。今天，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对于斯坦因骗取敦煌宝藏的行径应当严厉谴责。同时，我们也应当尊重客观事实，承认斯坦因是第一位科学地记录了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莫高窟艺术面貌的考古学家。

1908 年 2 月，沿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进行考古的法国人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休整时见到两件敦煌写经，立刻赶往敦煌。由于他可以讲流利的汉语，很快被王道士允许进入藏经洞内拣选写卷。伯希和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所有洞内的资料，因此为自己订立了几个选择标准，即选取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估计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与文书。伯希和以 500 两银子换取藏经洞精华，他的选择标准，以其带回巴黎的写卷所含研究价值往往高于伦敦所藏斯坦因卷子而被学者们所称道。然而，这样一来，伯希和把斯坦因已经搞乱的藏经洞包裹，全部打散，我们再也无法恢复藏经洞写卷经帙合一的原貌了。

伯希和在敦煌的三个月间，除了翻检敦煌藏经洞文献外，还第一次给莫高窟有壁画的洞窟统编了号码，抄录了壁画上的各种文字所写的题记并记录了相关的内容，拍摄了主要洞窟壁画、雕塑的照片。此外，他还在莫高窟北区的洞窟中，发现一批回鹘文、西夏文的写刻本。

1909 年 8—9 月间，伯希和已经把大批敦煌收藏品运送回国，又从他供职的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北上，到北京购书。他随身



携带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些珍本文献，如《古文尚书》、《毛诗》、《论语郑氏注》、《左传杜预集解》、《春秋谷梁传》、《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老子化胡经》、《摩尼教残经》、《景教三威蒙度赞》、《修文殿御览》、《文选李善注》，以及拓本、印本、经帙、归义军官私文书、邈真赞等。以罗振玉为主的一批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先后往伯氏寓所参观、抄录这些文献材料。9月25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首次公布了伯希和在敦煌的新发现，并把这个消息通报给日本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随后，他把自己和蒋斧、曹元忠抄录的敦煌写本辑印成《敦煌石室遗书》（1909），同往抄录文书的王仁俊，也辑印成《敦煌石室真迹录》（1909），两书录文前后，附有他们所写的跋语，成为敦煌学的第一批文字。伯希和写于莫高窟的简要考察报告《甘肃发现的一个中世纪书库》（中译本题《敦煌石室访书记》），虽然发表在1908年号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EFEO）上，但实际出版年份要晚于上述罗、王诸氏的著作。伯希和骗取敦煌宝藏的行为，同样应当受到谴责。但伯希和的北京之行，无疑促进了敦煌研究在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兴起。

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获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的写卷，于是提请学部收集。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督何彦升，把所余经卷悉数运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其实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并没有十分用心，虽然运到北京的残卷超过一万个编号，但留在当地的写本和残片也不在少数。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获得数百写卷和一些残卷。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到敦煌，又获得300多个卷子和一万余号残片及绢画等，据说他们是通过发掘得到的，而且他们还测绘了莫高窟的许多洞窟，拍摄照片，但由于这些考古记录迄今没有发表，所以不得其详。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斯坦因的记载最有参考价值。斯坦因



的敦煌之行是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他先出版了有关这次探险的个人游记《沙埋契丹废址记》（二卷本），其中详细叙述了藏经洞的发现和它与王道士交易的过程。1921年，他又出版了5卷本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其中第22章专讲藏经洞的发现，其他几章分述敦煌千佛洞的历史、莫高窟壁画、出土的丝织品和写卷，附有详细的出土文物目录。同年，斯坦因还把藏经洞出土的48幅精美绢画，用彩色和黑白图版影印，辑成《千佛洞》一书出版。遗憾的是上述游记和报告没有中文译本，许多研究者只能依赖向达翻译的斯坦因有关他三次中亚探险的讲演稿《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因此对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最初的内部状况不甚了然，以至产生误解。1977年，米尔斯基出版了斯坦因的传记，中文译本题《斯坦因：考古与探险》（1992），也透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藏经洞发现的史料。

在斯坦因发表他的正式考古报告的同时，伯希和将他在敦煌所摄制的莫高窟照片，于1920—1924年间分六册以《敦煌石窟图录》为名出版。这套图版和斯坦因考古报告及《千佛洞》所刊敦煌壁画、绢纸画的图版，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研究敦煌考古艺术的主要依据。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解放后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敦煌文物的保护、修整、研究和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做出很大贡献。

至于分散在伦敦、巴黎、京都、圣彼得堡等地的敦煌文献材料，人们开始时只能以“挖宝”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研究所需要的材料，陆续出版了许多专题研究论著。60年代以来，英、法两国先后公布了所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近年，《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以及一些收藏敦煌卷子较少的单位，都陆续以清晰的图版公布所藏，使敦煌文献的全貌